

目 录

于 刚	新政协筹备期间对一些政治派别和团体要求 参加新政协的处理经过……………(1)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 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其他
周士观	回忆我所参加的军事策反工作……………(19)
	一、我在重庆时的一些政治活动 ……………(20)
	二、向党靠拢和参加军事策反工作……………(23)
	三、我和马福祥、马鸿逵父子的关系……………(37)
凌其翰	国民党政府和法国在接受日本投降期间关于 越南的外交 ……………(40)
	前 言 ……………(40)
	(一)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3)
	(二) 初抵河内……………(48)
	(三) 返渝请示……………(50)
	(四) 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典礼……………(52)
	(五) 飞越复命……………(54)
	(六) 一时无法解答之谜……………(56)
	(七) 宋子文紧跟蒋介石……………(63)
	(八) 初步探索……………(70)
	(九) 货币战争……………(80)
	(十) 河内的恐怖……………(82)
	(十一) 蒋介石给胡志明的口信……………(84)

~

(十二) 马克斯·安德烈·····	(89)
(十三) 拉乌尔·萨朗·····	(90)
(十四) 卢汉对中法谈判的态度·····	(96)
(十五) 中法协定的签订·····	(98)
(十六) 法越初步协定·····	(105)
(十七) 海防中法军队冲突事件·····	(116)
(十八) 交防期间的酬酢·····	(124)
(十九) 西贡之行·····	(133)
尾声·····	(137)

李修业 苏军进入东北前后····· (141)

(一) 苏军进入东北以前·····	(141)
1. 苏联对我国抗战的支援·····	(141)
2.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我国抗战的影响·····	(144)
3. 苏联在击败德国之后的对日作战准备·····	(145)
4. 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远东军区实力的估计和战略部署·····	(149)
(二) 苏军进入东北以后·····	(154)
1. 苏日两军激战·····	(154)
2. 苏军分区占领和接受日本投降·····	(155)
3.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57)
4. 苏军拖延撤军·····	(159)
5. 宋美龄慰问苏军·····	(167)
6. 召开记者招待会，迫苏撤军·····	(169)
7. 苏军阻止蒋军接收·····	(171)
8. 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176)
9. 国民党军的“劫收”·····	(180)

新政协筹备期间对一些政治派别和团体 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处理经过

于 刚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以后。当年八月，中共中央邀请在香港的以及国内外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参加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取得一致认识。确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林伯渠：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制订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筹备会常委会，确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

个工作小组,进行具体工作。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李维汉任组长,章伯钧任副组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胜、陈叔通、曾昭抡、许德珩、蔡畅、黄振声(黄鹤楨代)、罗叔章、天宝、陈其瑗等22人为组员。我担任这个小组的秘书,参与了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工作。

“在筹备工作进行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三十件团体的和个人的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都经慎重严肃的考虑,分别加以适当的处理。”(林伯渠: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基本指导思想,首先注意的是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份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

(2) 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作适当安排，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的许闻天、邓昊民两先生，民社党革新派中的沙彦楷、汪世铭两先生等，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一届政协会议的。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光复会的周亚卫等先生，分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等职务，一九五四年被邀为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3) 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向有关党派推荐。

(4) 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

总之，既要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又要实现团结的广泛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下面，对其中一些主要的政治派别和团体的情况和处理经过，作一些简要回顾，以期有助于了解当时我国政治情况的一个侧面，保存一些有关的史料。因系个人回忆，难免有遗漏和不准确之处，希望有关同志给以补充和指正。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

一个政治派别。它的前身名中国农工社会党。早在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分子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两个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一九四五年这两个小团体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无形解体。迨至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原农工社和大众社的成员在南京发起组成中国农工社会党。主要有三部分人：（1）曾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一些人，如许闻天等。（2）曾参加邓演达所组织的第三党的一些成员，如邓昊明等。（3）从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如贺耀祖、陈惕庐等。该党成立后曾派人去香港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要求作为民革的一部分。当时，朱蕴山代表民革表示欢迎，同时要求他们更改党的名称。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但并未并入民革。孙盟的主要负责人有许闻天、邓昊明、高宗禹、韩梅岑、陈惕庐、贡沛诚、谌小岑、刘不同、贺耀祖、侯桐、杨玉清、金绍先等。

孙盟的政治主张的积极面是联共反蒋，要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在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前，曾派人同苏北中共党组织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后来也曾派人去香港同中共在港负责人联系。它的领导层中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参加。对于党的“五一”号召，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

孙盟在解放前处于秘密状态，一部分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中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做过军事策反活动，在国民党立法院内做过一些合法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香港参加过争取

国民党在港立委、监委等高级军政人员起义的活动。由于组织不严密，成份不纯，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和成员曾遭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逮捕和杀害。

孙盟曾在南京、上海办有《中国日报》、《虹光周报》、《大学评论》等刊物。

一九四九年六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这个团体对革命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份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以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六月十九日，李维汉同志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讲了第一小组的这个意见，获得了筹备会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京商谈孙盟的事。许来京后写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工作节略》，简要介绍了孙盟的组织经过和解放前的活动情况，表示热切盼望中共的直接领导，如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也可以立即解散组织。同时提出，希望中共能给予该盟同志精神上的一点安慰。李维汉同志同许闻天先生谈了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出该盟的重要成员如刘不同、陈惕庐等作例，指明这个团体的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以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许闻天、韩梅岑、侯桐等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

负责人在上海集会讨论，一致同意孙盟结束活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在沪宣告解散，并由新华社发了消息。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邓昊明二先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一月，许闻天、贺耀祖、谌小岑、胡庶华、金绍先五位原孙盟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许闻天、贺耀祖曾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

民社党革新派

民社党革新派全称“革新中国民主社会党”，系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张君勱等决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大”和“改组”的国民党政府以后，由民社党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所组成。其组织成份比较复杂，负责人中有的与美帝关系密切，有的是国民党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有的是既反蒋也反共，主张走第三条路线的人，也有少数反蒋民主人士如沙彦楷、汪世铭等等。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以后，该派发生分化。沙彦楷、汪世铭等曾以民社党革新派的名义，发表文告，响应“五一”号召。当年秋，该组织将孙宝刚、罗坚白等开除出去。主席伍宪子亦于此时宣布退出。由副主席沙彦楷任代理主席。十二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该组织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宣称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及生产劳动大众利益”，主张“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以地主、买办及

贪污腐化集团为基础的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了彻底消灭革命的敌人，为了加速革命战争胜利而共同奋斗。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汪世铭自香港来京，通过李济深、章伯钧、陈叔通三位致函周恩来同志和李维汉同志，转交了《民主社会党党内斗争经过》和《告全党同志书》，要求参加新政协。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期间，第一小组研究了民社党革新派要求，提出了处理意见。六月十九日，李维汉同志在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讲了第一小组的意见。他说，在今年（一九四九年）春季，中共中央曾与在京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对民社党革新派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问题，作过研究与协商，认为该派在成立后几年中，经过一些曲折和几次分裂。在民社党革新派内部确实存在民主分子，他们也是努力奋斗的，但就该派整体来说，确实成份复杂，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必要参加的民主分子，可以考虑个别邀请。这个意见为新政协筹备会议所同意。

六月二十二日，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自上海致电毛主席和新政协筹备会，声称“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四十五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六月二十七日，李维汉同志会见汪世铭，向他表示，经与各方面商讨，认为民社党革新派成份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建

议他们考虑自行结束。其中的民主人士代表人物，可由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以个人身份参加。成员中的民主分子，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参加民盟，他们中如有被误认为反动分子的人，可将名单开来，以便协助解决。汪世铭表示同意，并说已函请该派组织暂停活动。

这次谈话后不久，社会上发现以民社党革新派名义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对他们未被邀请参加新政协表示强烈不满，态度很坏。经向汪世铭、沙彦楷两位询问，他们表示事先不知道，愿意公开予以驳斥，自行处置。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民社党革新派决定自行解散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沙彦楷、汪世铭二先生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汪世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中说，“我是革新民主社会党负责人之一。三年前因为张君勱及其走狗们破坏旧的政协，破坏民主统一战线，厚颜无耻地参加了伪国大，参加了伪政府，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帮凶。”“我们党内忠于民主与和平的同志们表示万分的愤慨，不能不起来反对他，打击他，所以才有革新的民主社会党的组织。”三年来，“有许多同志受了蒋匪特务的迫害，坐了牢，受了刑，甚至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但是我们内部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分子复杂，又没有严格的纪律，往往发生了错误的言论与行动，招致恶劣的影响。”“我们已经决定结束我们党的活动，取消我们党的组织。我们的同志有的因为历史关系，将要加入民主同盟，有的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青年组织，有的参加学习与工作了。我们将在不同的岗位上，接

受统一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遵循统一的路线，向着统一的目标，努力前进。”

中国少年劳动党

中国少年劳动党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成立，负责人是安若定。安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大学组织“孤星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出版过《孤星》旬刊，宣传三民主义。一九二七年以后，埋头著述，曾出版《大侠魂论》，鼓吹超阶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大侠魂精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创“铸魂学社”。这是一个“主张修身立命，匡人救世及文武合一、知行合一”的文化社团，曾吸收一些爱国青年，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五年以“铸魂学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劳动党。嗣后陆续参加的一些会社有关人士有：中国合作经济研究会、中国崇实学社、中国幼幼协进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乡村建设协会、中国民族素质改进会及国术研究会等，还有一些佛教方面和原属国民党方面的人员。（据《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声明并告全党同志书》）一九四八年曾表示响应“五一”号召。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一度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进行过策反工作。该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松懈，成员复杂。主要负责人为安若定、张德流、罗春台、马辉、牛席卿等。

一九四九年五月，安若定及上述诸人来京活动，要求少

年劳动党作为新政协参加单位。李维汉同志两次会见安若定。鉴于少年劳动党成份复杂，组织也不健全，建议他们考虑解散组织。安若定等商议决定自行解散。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发表《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通告》和《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声明并告全党同志书》。宣称该党“由于组织不严，分子不纯，对革命的贡献不多。”“现在人民解放事业已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得到决定性的胜利，新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即将建立，把握现阶段的革命政治要求，本党已无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所以决定于九月一日宣告正式解散，深望本党同志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改进自己的认识，和广大人民一道，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从事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安若定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一九五四年任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光 复 会

光复会最先于一九〇四年成立于上海，当时会长为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是该会重要领袖人物。以提倡反清革命为宗旨，曾进行过不少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和同盟会发生矛盾，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致电广东都督陈竞存，进行调解。一九一二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杀，该会无形中解体。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光复会的老人尹锐志、周亚

卫夫妇等在重庆恢复该会，尹任会长，周任副会长。抗战胜利后，总部由重庆迁浙江杭州，尹锐志去世，周亚卫任会长。据该会宣布，领导成员还有吕公望、裘振纲、许啸天、王晓籁、鲁莽、高剑华、黄光德、沈钧业、黄元秀等，实际上其中不少人是挂名的，主要负责人为周亚卫、裘振纲。会员成份复杂，除了一些老光复会的会员及个别开明士绅外，多为失意政客及国民党的退伍军官。一九四七年曾要求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未获准。同年四月二十二日被国民党政府通令取缔。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在杭州西湖召开干部会议，发表“政治报告”及“重要声明”，宣称光复会“不仅代表中间阶层如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建立“一切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建国联合政府，”“任何政党（民主党派亦在内）不得私有军队。”一九四九年一月曾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且策动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实现局部和平，事未遂。裘振纲在解放前夕任浙江省 化县长，人民解放军渡江进击浙江时，裘曾运动昌化、于潜县两个自卫队起义，协助解放了这两个县。杭州解放后，裘在报上著文自我吹嘘，受到中共浙江省委批评。息影杭市。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周亚卫、裘振纲、沈田萃、童杭时等代表光复会致电毛主席，声称“本会处于蒋党反动统治下，备受迫害，但仍尽力于民主事业。今浙江已告解放，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今后本会誓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民主事业尽其绵薄，并愿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六月下旬，周亚

卫为此来京活动。周恩来同志曾予接见，各方商谈结果：由于光复会成份复杂，成员中民主分子很少，因而未获邀请参加新政协。

周亚卫在一九五四年任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农民党

中国农民党，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成立，主席董时进，系农学界人士，一九三八年组织中国农业协进会，为农业学术团体。一九四四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时，董曾参加任民盟中委，后又退出。一九四六年旧政协会议时期，他联络农业协进会中一部分人，组成中国农民党。成员中有一部分是不关心政治的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另有少数反动分子。该党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三中全会修订的政纲主要有以下四项：（1）建立民主政治；（2）促进经济发展；（3）合理分配财富；（4）消除一切战争。同年董时进公开著文反对共产党，反对党的土改政策。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人民大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形势下，农民党发表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一九四九年四月，董时进自香港派他的代表来北京，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要求：（1）设立“中国农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平联络处”；（2）出版《中国农民》，开办“新农通讯社”；（3）与新华社及各新闻机构建立正式关系；（4）参加各民主党派有关民主运动的集会与联合声明。

五月十七日，董时进自香港抵北京，致函周恩来同志要求会见。六月五日，李维汉同志约见董时进，同他进行谈判，指出董时进和农民党的反动言行，批评了他在一九四八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是力图为地主阶级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因而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并向董说明：农民党参加新政协是困难的，劝董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希望他把技术介绍给人民政府，为农业建设服务。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

六月二十五日，农民党在北京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宣称：“本党中常会议决，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董时进自上海上书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为封建地主阶级辩护，要求停止进行土改，修改土改政策，并在上海散发反对土改的传单，因此中共华东局统战部派人找董谈话，提出批评，制止他这种违反共同纲领的行动。

一九五〇年四月，董时进去香港旋去美国。

中国民治党

中国民治党一九四六年八月在上海成立。主要由国内外

华侨洪门中一部分人所组成。该党从一开始，就有国民党CC分子与军统特务分子混入，操纵指挥。其成员的政治情况极其复杂。主要负责人是赵昱和张书诚。赵系美洲华侨，早年曾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负责海外筹饷。张书诚系国民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出席过国民党“六大”。重要成员有朱金石、杨天孚、朱家兆、邓云章、黄子和等。

一九四七年二月，赵昱、杨天孚等曾在CC支持下，与国民自由党、民生共进党等合组中间党联盟。

一九四九年新政协召开前，民治党派人来京活动，要求承认合法地位和参加新政协。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各民主党派商量，向该党负责人任荣野、黄守中等正式说明，民治党不能列为民主党派，要求他们自行解散。此后，他们又拟与致公党合并，为陈其尤等所拒绝。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最初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为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熊朱其慧，还有陶行知、黄炎培先生等。成立时选出熊朱其慧、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张训钦、蔡廷干、周作民、陈宝泉、周诒春九人为董事。熊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晏为四川巴县人，自幼受基督教会培养，后入美国耶鲁大学学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教会派遣，去欧洲搞华工工作，对

华工进行识字教育。战后回国，服务于余日章主持的青年会，从事平民识字运动。曾和傅保琛编了平民千字课，也曾同陶行知合作过。他搞平民识字运动得到熊朱其慧的经济支持，又有青年会的帮助，得以到上海、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宣传活 动，所以平教会成立时，他担任了总干事。

平教会系私人事业团体，无一定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入会手续，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募捐，主要活动是从事乡村农民文化教育。初成立时会址设在北京，一九二七年迁河北定县，创办定县实验区。该会在定县期间，曾罗致一些留美知识分子，其中如瞿菊农就为该会担任定县实验区主任。晏阳初在定县期间，鼓吹中国社会的病根有四，即愚、贫、弱、私，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进行四项教育，以生计教育救贫，卫生教育救弱，文化教育救愚，公民教育救私。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会迁湖南长沙，在衡山举办平民教育实验区，并进行了一些抗日宣传活动。一九三九年迁四川巴县，直到全国解放。

平教会在四川巴县期间，主要举办三项业务。

（一）乡村建设学院。一九四〇年创办，原名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一九四五年八月扩充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兼院长，院址在巴县歇马场，设乡村教育、社会、农学、农田水利四系。

（二）华西实验区。一九四六年七月，得到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同意，在该省第三行政区辖区内开始进行综合性的乡